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下

金大陆著



FEICHANGYUZHENGCHANG
SHANGHAIWENGESHIQIDE
SHEHUI SHENGHUO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金大陆著

FEICHANGYUZHENGCHANG
SHANGHAIWENGESHIQIDE
SHEHUI SHENGHUO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金大陆
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4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ISBN 978-7-5326-3284-8

I. ①非... II. ①金... III. ①社会生活—研究—上海市—1966~1976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1085号

责任编辑 余 岚
封面设计 姜 明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下)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56 插页 4 字数 676 000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3284-8/K·769

定价:8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2431119

目 录

第十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生产和供应	1
一、一般情况与特别方面	1
二、“菜农不吃商品粮”	8
三、郊菜、客菜与价格	15
四、供应与服务	25
五、两条波动线	36
附一：上海“文革”时期菜场、批发机构及其包装、运输等情况	45
附二：上海“文革”时期蔬菜加工业及其供销	48
第十一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粮油供应	
——兼论“国家管理”的“在位”	53
一、上海的粮油市场	53
二、口粮、口油与票证管理	61
三、粮价、油价及其议价销售	69
四、粮食管理的两项举措	72
五、“国家管理”的“在位”	78
附一：粮库、粮店与粮食保护	93
附二：上海“文革”期间其他副食品供应情况	97

附三：上海市打击投机倒把总指挥部《打击投机倒把简报》

第一、二、六期 118

第十二章 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

——以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为个案 122

一、传媒话题的舛误与厘正 122

二、三项持续性的保证 126

三、记忆建构时的史实假托与价值取舍 141

附：上海“文革”时期的禽蛋供应 149

第十三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水产品生产和供应 157

一、资源与资源链的断裂 157

二、供应与票证 165

三、供应与价格 169

四、简短的结论 173

第十四章 像章“问题” 176

一、非常的时尚与收藏 176

二、交换场所的背后 180

三、整肃活动 183

四、所谓“拘留者” 187

五、部队与地方 189

六、从高潮到消歇 191

第十五章 上海的几尊毛泽东塑像 198

一、一尊毛泽东不锈钢胸像 198

二、两尊毛泽东金属立像 200

三、第一尊校园塑像	203
四、其他的塑像	206
五、荒诞与失当	212
附：来自北京的消息	221
第十六章 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	229
一、四类报刊	229
二、第一类报刊与第二类报刊的沟通	234
三、对第二类报刊的整顿	235
四、对第三类报刊的整肃	242
五、对第四类报刊的查处	249
附表：	
表一 上海“文革”运动中主要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	256
表二 上海“文革”运动中各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主办的 报刊(铅印版)	262
表三 上海“文革”运动中各系统、单位群众组织主办的 报刊(铅印版)	269
表四 上海“文革”运动中外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在 沪主办的报刊(铅印版)	285
附一：披露一条史料	291
附二：一点佐证	294
第十七章 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宣传品”	296
一、从传单到可供买卖的“宣传品”	296
二、制止与反制止	299
三、一份调查报告	303
四、“政治影响”与“经济得失”的博弈	307

附一：关于《红卫东》刊和八种批判资料发行销售情况的 调查报告	312
附二：关于上海大批判资料的情况	316
附三：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文革”资料出售情况(1968年 4月22日—12月23日)	319
附四：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通讯录(1967年11月)	322
附五：“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收藏图书馆类 资料的整理和说明	324
附六：“文革”时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交换资料中的 印章汇编	341

第十八章 “深挖洞”——以上海1969年至1978年的

人防工程为中心	357
一、缘由与背景	357
二、“深挖洞”的三个阶段	360
三、人力、物力与财力	370
四、演习记录	378
五、一条弯曲之道	388
附：上海“深挖洞”运动期间人口疏散情况(1969年至 1974年)	398

第十九章 “野营拉练”——以上海1970年至1974年的

“野营拉练”为例	400
一、野营拉练的缘起	400
二、高潮与高潮的退落	403
三、不同的拉练队伍	408
四、回答三个问题	420

附：《野营进行曲》两首	428
第二十章 题旨和结论	429
一、“文革”研究的“两个支点”	430
二、“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	432
三、“文革”研究的“两个向度”	437
四、“文革”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范式”	440
五、“文革”社会史研究的昭示和价值	445
后记 心心念念	450

第十章

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生产和供应

一、一般情况与特别方面

根据上海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状况(市区常住人口共五六百万),这座城市每天需要供应 500 多万斤蔬菜(合 2 500 吨),如果以火车运力计算的话,大致需要 100 多个车皮,可联结一里多长。如此数量的蔬菜供应和消费,主要依靠市郊菜农长年累月的生产,以保证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城市的正常运作。

按照时令,上海年度蔬菜生产分“三播”,即春播、秋播和冬播,^[1]且受气候影响甚大。上海四季分明,适宜作物生长,但夏季常有暴雨(降水过多,易遭明涝暗渍灾害)和高温(日照强烈,易引起茄果类蔬菜灼果),如 1971 年 6 月 26 日至 8 月上旬,上海持续高温干旱 40 多天,其中 35℃ 以上多达 17 天,引起红蜘蛛大暴发。接着,8 月中旬至 10 月上旬,总雨量又多达 370 毫米以上,造成蔬菜大缺;冬季则常有寒潮(最低气温连续两天降到-7℃ 以下,大田蔬菜冻害),如 1967 年 12 月 29 日至 30 日,上海最低气温降到-8.2℃ 和-8.5℃ 以下。1968 年 1 月上旬至 3 月下旬,蔬菜上市量大幅度下

降,缺菜情况严重。〔2〕所以,一般年景下,上海8—10月称为夏淡季;12月至翌年3月称为冬淡季。

为保障城市供应,市人委于“文革”运动前的1963年批转了《关于改进蔬菜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三十五条》),不仅将上海的蔬菜生产面积保持在18万亩左右(整个“文革”期间至80年代末,上海的菜地面积基本稳定在这个数量上),还调整了郊区菜田的布局,大致分为常年菜田:主要分布在近郊或中郊,交通便利,生产条件良好,有悠久的种菜历史。一般种植生长期短、管理精细的常年品种,并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保证种足种好,不能移作他用。轮作菜田:约有3万亩,主要是为了平衡产销,故安排大熟种棉粮,小熟种蔬菜,以减少旺季上市和增加淡季供应。季节性菜田:在棉粮生产空隙栽种一熟蔬菜,如崇明大白菜,嘉定蒜头、葱头等,至70年代中期共有菜田6~7万亩。〔3〕

再据具体的调查和统计,上海“文革”期间共有52个种菜的农村人民公社,其中27个“以菜为主”,它们分别是所属近郊上海县的新泾(1965年至1979年,有菜田8768→9610习惯亩。下同)、虹桥(11590→14707习惯亩)、龙华(2644→2808习惯亩)、梅陇(7275→7599习惯亩);嘉定县的长征(15063→14862习惯亩)、桃浦(7273→8148习惯亩);宝山县的彭浦(9399→9185习惯亩)、江湾(7468→7577习惯亩)、五角场(3366→3570习惯亩);川沙县的杨思(7231→7332习惯亩)、六里(5943→6127习惯亩)、严桥(6972→6988习惯亩)。所属中郊上海县的华漕(3510→4156习惯亩)、纪王(2830→2918习惯亩)、七一(4301→4484习惯亩)、三林(7149→8072习惯亩);嘉定县的封浜(3600→3930习惯亩)、江桥(8483→8883习惯亩);宝山县的庙行(5620→6157习惯亩)、大场(6826→7757习惯亩);川沙县的花木(5579→6552习惯亩)、北蔡

(5 229→6 069 习惯亩)、洋泾(7 326→7 573 习惯亩)。所属远郊嘉定县的黄渡(8 096→8 957 习惯亩);青浦县的白鹤(6 138→6 130 习惯亩)、华新(4 522→4 659 习惯亩)和南汇县的周西(4 120→5 139 习惯亩)等。^[4]由此可见,在整个“文革”期间,除了个别单位如嘉定县长征公社、宝山县彭浦公社的菜地面积有少量缩减外,绝大多数人民公社的菜地面积是有所增扩的,以致到 1976 年时,郊区计划常年菜田达到 18.7 万亩。^[5]其实,这正源于上海蔬菜产销主管部门制定的“以销定产,产略大于销”的原则,那就是郊县菜区人民公社必须按照年度生产和上市计划,统筹安排茬口、品种(一般细品种的产量不少于总产量的 38%)。为了做到均衡上市,各生产单位交叉配套的播种、收摘计划,甚至要精细到季、月、旬、日。^[6]



上海郊县菜田,毛主席“宝像”摆田中
(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如果说以上是上海“文革”期间蔬菜生产的一般情况,那么以下三点便是上海“文革”期间蔬菜生产的特别方面。

第一,蔬菜栽培技术有所发展。“文革”前夕,市农业部门为提高蔬菜种植技术,建立了农科院园艺所,并在近郊四个县设立蔬菜技术推广站,开展从国外、外地引进、培育新品种的工作。因此项工作的纯技术性质,且直接关涉蔬菜生产的品质、产量等要素,故在“文革”

期间,非但没有间断,仍有步骤、有规模地持续进行。以番茄为例,1966年川沙农业局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引入“北京早红”品种,成熟早,结果多;1971年宝山江湾公社从浙江农业大学引入“日本大红”;1972年市园艺所又从日本引入“强力米寿”品种。至1973年,市园艺所与宝山彭浦公社合作,采用杂交技术育成红度足、果形大、不开裂、产量较高的浦红1—8号系列番茄。^[7]其他于70年代引进、培育成功的蔬菜品种还有上海县新泾公社耐热、抗病的“揩青冬瓜”;先后在嘉定、宝山、川沙三县获得推广的“丰收白”、“白头翁”马铃薯;早熟、丰产、抗病的“上海黄瓜”以及由川沙县严桥公社试种的茎椰菜;上海县虹桥公社引种的荷兰豆等。与此同时,70年代初上海县新泾公社、川沙县洋泾公社、严桥公社、嘉定县长征公社等采用塑料薄膜覆盖技术,反季节地种植辣椒、番茄、茄子、芹菜、草头、蓬蒿菜等,“使市区工人和居民在严冬也能吃到原来在春季、夏季才能上市的蔬菜”。^[8]另外,蘑菇、香菇等食用菌栽培也于同期在市郊获得推广。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在“文革”动乱的背景下,上海的蔬菜栽培技术怎么还会有平稳的进步呢?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一定的条件下,生产、技术方面的小环境,相对于(或者说假借于)政治动乱的大环境,



上海郊县的蔬菜技术推广站
(引自秦风老照相馆《上海制造》)

保持了正常的间隔和独立,得以遵循一条正常的技术发展的路径(此属“非常中的正常”)。而况,蔬菜生产保障着城市供给,城市供给是任何当政者都必须正视的,某种意义上还是衡情度势的权重或标识。同时,“文革”前就建有农科院园艺所、县蔬菜技术推广站等,其构架和职能决定了推进蔬菜栽培技术成为工作之必需。正是这

些因素的集合,促成了上海“文革”时期蔬菜栽培技术的进步,甚至为往后的发展打造了基础。

第二,近郊菜田污染日趋严重。据 60—70 年代的统计,上海全市每天有近万家工厂的 7 000 多根烟囱和市民的 80 余万只煤球炉在排放废气;每天有约 500 万吨的废水直接排入工厂附近的河道。废气在空中形成酸性烟雾或酸雨,下降后造成菜区叶枝枯黄,果菜败落;废水则随潮涌漫溢,污染水体,尤其上海自西向东,有普陀、彭浦、杨浦等工业区,其间的桃浦河、彭越浦、蚂蚁浜、俞泾浦、沈金港、沙泾港、界泓港、随塘河等多南北流向,清水来源少,自然稀释能力低,河水中的有害物质镉、汞、铬、酚等含量远远超过灌溉标准。北新泾、漕河泾、长桥地区的新泾港、蒲汇塘、龙华港及浦东沿江地带的白莲泾等河段水质也因工业排放受到污染。严重的情况是这些污染源恰恰与近郊菜田联结一体,农业的灌溉显然成了工业排放的牺牲。至 70 年代后期,彭浦、桃浦、长征、梅陇、六里、花木等公社都曾发现蔬菜中的有害物质超过含量标准而不允许上市(三林、桃浦等公社曾将高浓度的镉泥当作有机肥试用,结果直接导致这部分菜田不能种植)。据调查,1979 年全市有 10 570 亩菜田受到了中等程度的工业污染,分布在 11 个公社、36 个大队,占全市菜田面积的 5.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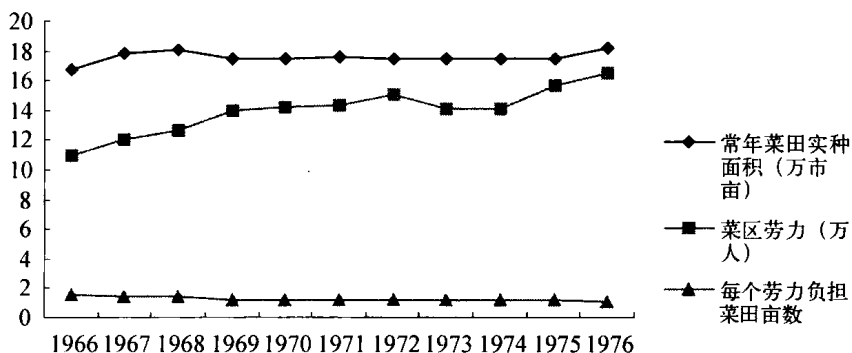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上海的工业污染祸害近郊的蔬菜生产是否起始于“文革”期间?回答是确切的。首先,这是因为解放十七年来(1949—1966),上海的工矿企业曾有较大规模的建设,且多坐落在市郊接合部。其初期的排放到污染祸害的呈现应有一个累积的过程,而这个累积过程的最终构成,大致是在“文革”期间。其次,因上海“文革”运动未曾发生两大派的“军械性”武斗,上海“文革”时期的工业生产亦基本未曾中断,尤其在“抓革命,促生产”及各类政治口号的鼓动下,甚至还会传来频频的“捷报”。然而,当时的工业生产未曾处

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监督之下,工业排放非但得不到有效治理,反而速度加快,程度加深,直至侵害近郊大片的菜田。与工业区相邻的嘉定县桃浦、长征;宝山县彭浦、江湾、五角场等菜区公社率先遭遇污染就是例证。当然,此处的结论不是说上海菜区的污染是由“文革”直接导致的,而是说多种因素的集合效应恰恰在“文革”时期呈现了,爆发了。

第三,“种菜人与路线图”。先看表一的曲线走势:上海 1966 年至 1976 年常年菜田的实种面积(平均 17.6 万市亩),基本处于稳定的状态,尤其 1969 年至 1975 年间甚至没有变化。菜区劳力人数从 1966 年的 11 万人,到 1972 年的 15.1 万人,再到 1976 年的 16.5 万人,逐步走高;而每个劳力负担菜田的亩数,从 1966 年的 1.53 亩到 1976 年的 1.10 亩,则逐渐缩小。这三组数据的比对,说明上海的种菜人在积年累月的辛劳中,也面临着劳力与田地的矛盾,投入与产出的压力。

表一

1966—1976 年市郊菜区蔬菜面积、劳力情况表



资料来源:《上海蔬菜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7—108 页。

如果说这种矛盾和压力是上海郊区蔬菜生产本身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状态,那么,“文革”运动的政治路线,特别表现在“批林批孔”

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期，所谓“抵制资本主义倾向”、“抵制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等，确实干扰了正常的蔬菜生产。据报载：1974年8月，宝山县五角场公社一生产队多种了4亩产值高的花菜，公社党委立即组织社员批判“看价种菜”、“看价上市”，提出“不在价格上打主意，要在增产上下苦功”，硬生生地拔掉了这4亩超种花菜，种上了青菜；^[10]上海县新泾公社程桥大队批判“钞票里翻跟斗”，规定计划的品种，无论产值多高，一亩也不多种；无论产值再低，一亩也不少种。一次，蔬菜公司要求扩种3亩产量高的土豆，少种产值高的番茄（每亩番茄的收入是土豆的三倍）。结果，在已脱季的情况下，程桥大队从外队买来种子，完成增播任务。又一次，蔬菜公司为充淡季，要求程桥二队将17亩冬瓜提前上市。这批冬瓜尚未长足，若按原计划10天后上市，起码可以多收480元。结果，队委召开紧急会议，统一思想，第二天就采摘了两百多担冬瓜送到收购站。^[11]在此，蔬菜生产与市场供应确实处在互为协调、互为制约的关系中，其间既要遵循蔬菜生产的规律（气候、品种、茬口之类）；又要顾及市场消费的需求。然而，当下却是政治路线挂帅，大批判决定一切，生产的规律和市场的需求必须符合政治的轻重，其内在的活力和内含的戒律如何才能有效地作用呢？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究竟能从“文革”政治路线统辖下的蔬菜生产背后看到什么？应该承认，在“文革”的语境中，其政治路线具有强大的煽动功能和批判指向，在郊区蔬菜生产方面，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千方百计”，“心往哪里想，劲往哪里使，路走哪一条”等口号就是例证，^[12]以致生产的规律可以违背，供销社的秩序可以错乱。但是，同样在这些宣扬性的报道中，依然可以读出“种菜人”的种种坚持和屡屡努力。比如1974年8月，宝山县五角场公社工农大队将20多亩小白菜提前上市，若是再留七八天，浇上一遍水，就可以卖出好

价钱,社员群众中就有人议论“‘菜因’上市太可惜啦”;^[13]同年10月,嘉定县长征公社发生烂菜,有人提议迅速“改变种植计划”,上级组织则开展大批判,坚持“保品种,保面积”。^[14]甚至还有所谓“坏分子大垦十边地,扩大自留地种植玉米、青萝卜,到市区卖高价”而受到批斗等。^[15]没有“倾向”,何来“批判”?正是这些社员群众的“议论”、“提议”乃至行动构成了“倾向”;正是这些“倾向”的反复存在,说明“种菜人”不甘“文革”政治路线的搅扰,凭借多年的经验,孜孜地盼望“种好菜”、“卖好价”。确实,对“种菜人”来说,此中不仅有尊重蔬菜生产规律(“种好菜”),更有尊重蔬菜销售的价值规律(“卖好价”)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在政治路线的压迫下显得怯气而无奈,终究是在顽强地表达,是在持续地出现。

二、“菜农不吃商品粮”

1969年11月19日,《文汇报》头版在毛主席语录“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引下,发表了长篇报道《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和社论《赞“菜农不吃商品粮”》,正式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宁愿多收一百斤粮,不要多赚一百元钱”等口号。接着,12月1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文章《菜农不吃商品粮!》,直接将该口号推向全国,以致产生了“棉农不吃商品粮”、“果农不吃商品粮”、“林农不吃商品粮”、“茶农不吃商品粮”等连锁反应。这一从“生产—经济”领域伸展出来的“政治—路线”的旗帜,因背后有着巨大的权力掌握,因高悬在头顶上哗哗作响,一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

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属上海县梅陇公社(今属闵行区),是以种植蔬菜为主,粮、棉、油作物夹种的生产队。全队24户、118人,耕地107.8亩,^[16]平均每人二分四厘粮田。1969年该队获得农业生产大

丰收,亩产蔬菜 5 250 公斤、皮棉 107.5 公斤、油菜籽 134 公斤、粮食 1 079 公斤,成为上海县农业生产的典型。更为重要的是,全队年粮食总产量 59 108 斤,除去口粮,尚余 1 867 斤,做到了社员口粮自给。[17]

张春桥注意到牌楼十一队的情况,指示要从“政治高度”将菜农种粮得高产上升为“斗批改的方向”。[18]为此,徐景贤亲自去牌楼十一队蹲点,亲自审改《文汇报》的报道稿件,并将原来拟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改为社论发表,强调指出:“这件事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19]再据该报道称:去年,牌楼十一队曾少种八分早稻,有人提出多种八分蔬菜可多收入二百多元。多数队委认为这不是八分田之争,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补种了八分早稻。为提高粮食产量,牌楼十一队积肥上万担,每亩粮田施肥 150 担。大忙时节,白天队里将主要劳力放在粮食生产上,部分辅助劳力用来管理蔬菜和棉花,晚上再集中全力抓好蔬菜种植。该队生产队长也发表长篇采访文章(因队长不识字),表示“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因为 1967 年社员口粮自给率达到 80% 以上时,该队队委就提出“常年亩产两千斤,实现口粮自给”,结果“一部分



摘自《支部生活》1970 年第 1 期